

# 梁方仲遗稿

读书笔记（上）

读书笔记（下）

听课笔记

新拾文存

明代地方志综目（草稿） 明代督抚表列

案头日历记事

信札、珍藏书画、遗墨观痕

附录：梁方仲学术评价实录

上架建议：文集

ISBN 978-7-218-13211-2



9 787218 132112 >

封面设计：集力書裝 彭力  
15920413547

定价：960.00元（全八册）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 梁方仲遗稿

附录：梁方仲学术评价实录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梁方仲遗稿 / 梁方仲著; 梁承邺等整理. —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9. 1

ISBN 978-7-218-13211-2


I. ①梁… II. ①梁… ②梁… III. ①中国经济史-研究-文集 IV. ①F12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35808 号

LIANG FANGZHONG YIGAO

### 梁方仲遗稿

梁方仲 著

梁承邺 李龙潜 黄启臣 刘志伟 整理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 版 人: 肖风华

出版统筹: 柏 峰 周惊涛

责任编辑: 陈其伟 周惊涛 柏 峰

装帧设计: 彭 力

责任技编: 周 杰 吴彦斌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 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 真: (020) 83780199

网 址: <http://www.gdpph.com>

印 刷: 广东信源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57.5 字 数: 3600 千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960.00 元 (全八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3157 83795240 邮购: (020) 83795240

《梁方仲学术评价实录——〈无悔是书生〉续篇》为梁方仲教授哲嗣梁承邨研究员所著。现将该书作为《梁方仲遗稿》附录，以便利读者了解梁方仲教授的治学方法、治学态度和学术贡献。

# 序 一

赵德馨

承邺师兄写《无悔是书生——父亲梁方仲实录》（以下简称《无悔是书生》）时，在电话中和我交换过意见。在写《梁方仲学术评价实录——〈无悔是书生〉续篇》（以下简称《续篇》）时，除了在书信和电话中交换意见外，还寄来初稿要我看看。我以虔诚的心、认真的态度细致地学习了，并将心得与意见写在相应处，寄回给他，供他修改时参考。这次，他又寄来清样，嘱咐作序。我又读了一遍。

《无悔是书生》侧重介绍梁方仲先生的生平，即他的为人。《续篇》侧重介绍梁方仲先生的学术，即他的为学（包括介绍其学术价值观、治学态度、研究方法和学术贡献诸方面）。两书合璧，向世人全方位地介绍了一个丰满的、生动的梁方仲先生。它们是一部结构巧妙的梁方仲传。

写传记本是难事，写学者的传记比写其他职业者更难，所写的学者若是父母，便是难上加难。这个难，难在对学术贡献的评价上。因为，要写传主在学术上的贡献，评价首先要专业，这要求作者必须对传主所从事的专业有深入的了解，否则只能是隔靴搔痒，言不及义。其次，评价不仅要专业，还必须准确。评价低了，委屈了先人；评价高了，读者会责难作者。要评得既到位，又妥当，除了要对传主所从事专业的学术史有深刻的把握外，还要讲求表述方式。

关于表述方式，承邺师兄在两本书的“前言”里已交代得清清楚楚。我想强调的是，他采取尽量做到用资料说话和用别人说的话，自己少说。对于儿女写父母的传记，这是很明智的做法。自己少说不等

于不说，因为在某些地方，非自己说不可。凡是这样的地方，承邛学兄遵循“说有容易说无难”的规范，慎用“首先”“第一次”一类的词语，使评价既科学，又留有让后人评说的余地，且彰显了梁氏父子谦逊之德。

由于表述方式得体，文字朴实流畅，笔端流淌父子情，这两本书都能调动人的感情。我读《无悔是书生》中1966年至1970年部分，看到梁先生受的屈辱与折磨，心中难受，泪眼婆娑。后来读《续篇》书稿，看到梁先生学问和声望在人们的心目中与日俱增，去世后还有那么多人思念他，学习他，对他的评价那么高，喜在心头。

承邛学兄毕业于武汉大学生物系，后来任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所长，从事的植物遗传育种与生物技术研究工作，属于自然科学。方仲先生专攻的经济史学科，属于社会科学。植物学专家儿子写经济史学专家父亲，隔了个大行当。承邛学兄退休之后，在近20年的时间里，集中精力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搜寻、整理方仲先生遗留的文献资料，力求齐全，片言只语也不放弃，与黄启臣、叶显恩、李龙潜、刘志伟、陈春声等经济史学专家一起，编成了《梁方仲文集》和《梁方仲遗稿》。二是写了《无悔是书生》正、续篇这两本书。在这个过程中，他熟悉了现代型中国经济史学自产生以来的史实，成了这个领域的专家。这使他在对方仲先生学术成就的评价上，分寸把握得很准确。

在和承邛学兄的交谈中，我两次对他说：“您光大了令尊大人的事业，是一个大孝子，为学人的后裔应该怎样对待先人的学术遗物，树立了榜样。对此，我心怀敬佩！您已经是一个中国经济史学史专家，为研究现代型经济史学的产生和发展史做了一项奠基性的工作。作为经济史学的专业工作者，我心怀谢意！”

2018年9月

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 序 二

黄启臣

今年是我读研究生（1961—1966）时的指导教师梁方仲教授诞辰110周年。恩师哲嗣梁承邨研究员（曾任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所长）撰著的《梁方仲学术评价实录——〈无悔是书生〉续篇》（以下简称《续篇》）将出版纪念，极具学术史价值，可喜可贺。承邨兄将书的清样本送来，嘱我为本书写篇序言。恭敬不如从命。我得先睹为快后，不揣谫漏，濡笔撰写如下作为第一读者的感受，也许是浮想联翩的题外话，不免乖谬，滥充序言。

我认识梁方仲教授是在1957年9月。当时我考入中山大学历史系读本科，在历史系举行的迎新生入学典礼会上，系主任杨荣国教授致欢迎词，除了向我们新生表示热烈欢迎外，着重介绍历史系有一支实力雄厚的、高水平的师资队伍给我们上课，希望我们好好向老师学习，学出好成绩。他还特别请参加典礼的梁方仲、刘节、董家遵、戴裔煊、朱杰勤、陈锡祺、金应熙等教授站起来让我们认识。那时我算是远距离单向认识梁方仲教授了。

1961年8月本科毕业，我服从分配到梁方仲教授门下读研究生，跟他学习明清社会经济史。当时培养研究生不是实行学分制，在四年学习期间，除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选读》和外语课由学校统一集中上课考试外，专业课则由指导教师全盘负责安排及考试。一、二年级时，老师规定我读完《明通鉴》《明史纪事本末》《国榷》《明史·食货志》《续文献通考》和马克思的《资本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等书，并要求读前五书时，把书中记载明代经济的条文页码记录

下来，方便以后研究利用；后两书中关于论述中国的全文则要抄录下来。一周读完一部分，然后于每星期五上午九时到他家里上课（因该年只招我一个研究生），把读不懂的文字和内容汇报，由老师讲课时解答。三年级上学期考试；下学期选定毕业论文题目，并拟出写作提纲。四年级全年写作毕业论文。我如数按老师规定读完上列书籍。到了寒、暑假，我不回家，在学校图书馆查读梁老师已经发表的《明代田赋初制定额年代小考》《明代户口田地及田赋统计》《一条鞭法》《明代银矿考》《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等45篇论文和《明代粮长制度》专著。这么一来，使我比较全面了解梁老师28年来潜心研究明清经济史的历程、内容和学术成就。三年级选择毕业论文题目时，我受到老师《明代银矿考》一文的启迪，选定《明代钢铁生产的发展》为题，得到老师审定首肯。

我读研究生四年，后因参加“四清”运动一年而延迟至1966年，又因毕业后留校等待分配工作，至1968年才离校。所以我跟梁方仲老师学习足足七个年头。加上2005—2007年我有幸参加整理、校订和编辑《梁方仲文集》（8册），使我更加了解恩师在北平社会调查所、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工作30多年来，一直以中国经济史研究和教学为“安身立命”的“名山事业”之学术生涯。现在又得先睹承邝兄大著《续篇》，更进一步加深了对恩师毕生治经济史的历程、内容和学术成就的认识。

恩师既然立志以学术为“名山事业”，所以他对自己研究经济史的学术价值观是以高标准著称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发表一篇论文，至少要站得稳几十年，即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在几十年的时间内都有人需要读你的文章，从中受到启发和教育”<sup>①</sup>。因此恩师每逢撰写或发表一篇论文，都是经过多次反复修改后才放心发表的，从而赢得“治学缜密严谨”的美誉而闻名于学界。我记得他撰写《明代里甲法和均徭法的关系》一文，请人抄正后命我于1962年8

<sup>①</sup> 李龙潜：《回忆梁方仲教授二三事》，载汤明棣、黄启臣主编：《纪念梁方仲教授学术讨论会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5页。



月送给《学术研究》编辑蒋祖缘。但后来他在一部清初的地方志发现几条与此文有关的明朝资料，又叫我去找蒋取回原稿，几经补充、订正和修改才送给《学术研究》，于1963年第4、5期连载发表。一丝不苟，严谨治学精神，可见一斑。正因为他的著述精益求精，所以多是见解独到、富于创新之作，被国内外专家学者广泛阅读、参考和引用。承邨兄在本书作了详细的统计，恩师生前发表和完成后来发表的51篇（部）论著，被学界引用者超过90%，其中《一条鞭法》《明代粮长制度》年引用率在1—3次；《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高达20次以上。而且发表时间与引用时间相隔年份最短为20年，绝大多数相距50—60年。这说明其论著经得起50年以上的历史考验。我相信以后还会有更多研究经济史的学者引用和参考其论著。

恩师梁方仲教授之所以发表高质量论著，同他身体力行20世纪初“新史学”（the new history）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有着极大的关系。所谓“新史学”，是1913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针对德国近代史学之父奠基人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关于“史料高于一切，要把历史学变为史料学”的实证主义史学研究方法而提出的。鲁氏主张“一定能够利用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关于人类的种种发明”，“打破俗套，去利用各种新科学上的新学说，而且要使历史同人各种学问革命的潮流里面去”<sup>①</sup>的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历史，又称“社会科学治史”。这种“新史学”方法就是要运用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统计学、考古学、生物学、天文学等综合研究历史问题。“新史学”方法于20世纪初传入中国，时称晚清新学大将、国学研究巨擘和以西方文明史学改造中国旧史学的“现代史界第一人”梁启超首先接受。他撰写和发表了《中国史叙论》（1901）、《新史学》

---

<sup>①</sup> 鲁滨逊著，何炳松译：《新史学》（*The New History, Essays Illustrating the Modern History Outlook*, New York, 1913），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序”第2页，“译者导言”第3页。

(1902) 两篇论文，推崇“社会科学治史”，批评旧史学缺乏多学科治史的视角，提倡：

夫地理学也、地质学也、人种学也、人类学也、言语学也、群学也、政治学也、宗教学也、法律学也、平准学也，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sup>①</sup>

梁启超还特别喜爱以统计学方法研究历史，说：

历史统计学，是用统计学的法则，拿数目字来整理史料推论史迹，“是专要看各种事物的平均状况，拉匀了算总账。<sup>②</sup>

此后，清华大学历史系首任系主任陆懋德和后者蒋廷黻也大力提倡“新史学”的“社会科学治史”方法。但梁启超等提倡多，实践则较少。真正提倡和努力实践“社会科学治史”并取得突出成果者，是1934年5月由吴晗、汤象龙、梁方仲、夏鼐、罗尔纲、谷霁光、朱庆永、孙毓棠、刘隽、罗玉东，以及后来加入的张荫麟、杨绍震和吴铎等，在北平酒醋局3号骑河楼的清华同学会创立的史学研究会同。因为他们之中有8人来自清华大学，所以有人又称为“清华史学研究会”。他们一致赞同和提倡“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内考据与综合并重”<sup>③</sup>的研究方法，“反对理论脱离历史实际和从理论到理论”<sup>④</sup>的研究方法，并且身体力行以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为重点，争取30年内写出一部《中国经济通史》，从而成为“新史学”的典范，其中最突出、最显赫的中坚分子，是梁方仲和汤象龙。

梁方仲于1933年清华大学经济系首届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在北平社会调查所（不久并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经济史组工作，从事明代赋役制度研究（在其研究生毕业论文《明代赋役史述

① 梁启超：《新史学》，载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87页。

②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17—218页。

③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8页。

④ 《汤象龙自述》，载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第三卷，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323页。

要》的基础上)。为了实践“社会科学治史”的方法，他博采历史资料，实事求是考察明代社会经济现象。除了收集官修的正史、实录、政书、编年史等史料外，还注意搜集别人不重视的地方志、部臣奏折、私人文集、笔记、民间俗本、平话、官私档案、历史实物和社会调查等资料，如清朝内阁大库档案、明清的赋役全书、粮册、鱼鳞图册、奏销册、土地执照、土地契约、串票、易知由单等，并对史料加以订正、考释，然后利用。1936—1937年，他与刘隽一起从清内阁大库档案中选择抄录与自己研究专题有关的档案资料，抄出了3万余条资料卡片加以利用研究，所以他撰写《易知由单的研究》（《岭南学报》第11卷第2期，1951年6月）这篇长达8万字的论文，就是利用顺治、康熙两朝的300多张易知由单档案原件，加上在清代地方志书找到明代易知由单的式样多件，再结合其他史书的资料而写成的，对明清两代易知由单推行200多年的历史演变过程作了深刻的论述，弄清了许多前人不清楚的问题，结论新颖，言之有据。他于1935年发表的《明代户口田地及田赋统计》（《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3卷第1期，1935年5月）6万字长文，内中又运用现代统计学方法，编制38个数据表格，将明代历朝的户口、田地和田赋数列出，使人一目了然。同时按照现代统计学规范开列出合计数、平均数、分区统计数和升降百分率，从而看到明代各朝不同地区的户口、田地和田赋的变化，使读者了解明代各地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可见此文是将现代统计学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之嚆矢；梁方仲实是实践以统计学方法研究明代赋役制度的创始人和坚持者。我们还在整理他的遗稿时发现《洪武十一年造军器统计表》《万历十七年与万历四十三年货物税额、货价对照表》《明万历各布政司各府州县税粮分组表》《清乾隆江苏省物价工资统计》《民国时期各省市历年户口表》《民国八年度与二十年度田赋比较表》等统计表。特别是他编著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宏著完成和问世（详后），说明梁方仲教授实是“开中国以现代统计学方法研究经济史的先河，成为中国将现代统计学方法运用到史学研究的统计学派开创者之一”的“经济

史统计大师”<sup>①</sup>。他的经济史研究超越了以史料考据的传统史学研究模式。

恩师梁方仲教授还遵循史学研究会创立时提出研究中国历史“我们愿意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就各人的兴趣和所学，就每一问题作广博深湛的检讨”<sup>②</sup>的宗旨，选择明代王朝贡赋制度体系的一条鞭法为切入点，开展明代赋役制度的研究，连续撰写发表了《一条鞭法的名称》（1936）、《一条鞭法》（1936）、《一条鞭法的争论》（1936）、《跋〈洞阳子集〉——兼论明隆万间江西一条鞭法推行之经过》（1939）、《释一条鞭法》（1944）、《明代一条鞭法的论战》（1951）、《明代一条鞭法年表》（1952）、《谈海瑞与一条鞭法》（1966）等8篇论文，以社会科学方法对一条鞭法产生的历史渊源、社会经济背景、内容、推行、演变、影响等进行系统的分析和阐述，其结论是前无古人的，令人信服，从而获得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极高评价，被指是一条鞭法研究的“最为全面和深邃”<sup>③</sup>的经典之作；是经济学家以历史学犀利眼光，“运用社会科学方法对王朝制度进行分析性研究的一个典范，在中国历史研究，尤其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具有开创性的意义”<sup>④</sup>；是近代以来系统而深入研究一条鞭法的第一人，特别是他指出的一条鞭法“形成了近代以至现代田赋制度上的主要结构”，“是现代田赋制度的开始”<sup>⑤</sup>的历史意义结论是极具创新性的。所以，《一条鞭法》发表后，1937年就由铃木正翻译为日文在著名的《历史学研究》第7卷第6、7号连载；1945年，美国太平洋关系学会又特

① 张剑平等：《新中国历史学发展路径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13页。

② 天津《益世报·史学》第一期，1935年4月30日，《发刊词》。

③ 黄冕堂：《明史管见》，济南：齐鲁书社，1985年，第373页。

④ 刘志伟、陈春声：《梁方仲先生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第70页。

⑤ 栾成显：《中国古代土地数字税亩说考辨——兼论梁方仲教授一条鞭法研究的贡献（附洪武丈量考论）》，载陈春声、刘志伟主编：《遗大投艰集——纪念梁方仲教授诞辰一百周年》，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4页。

约王毓铨翻译为英文，1956年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将该文与后来发表的《释一条鞭法》合译文列为《哈佛东亚研究丛书》第一种出版。美国著名中国近代史专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为英译本写了序言，高度称赞“一条鞭法”研究取得突破性成就，说：

这篇专著是论及明代后期赋税和劳役系统地改换为以银折纳制度迄今最深入的研究，它对中国近代货币经济发展的任何研究都提供了背景作用。<sup>①</sup>

恩师梁方仲教授在研究“一条鞭法”同时，亦研究与之有密切关系而负责催征、经收和解运田赋的粮长制度，在1935年发表8000字的《明代粮长制度》基础上，增补写成2.6万字的《明代粮长制度》长文，于《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7卷第2期（1946年7月）发表，又在此文基础上撰写成10万字的《明代粮长制度》专著，于1957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在此书中，他仍然以“社会科学治史”的方法，对明代粮长制度的历史渊源、设立粮长目的、粮长职务、特权、粮长的演变进程和粮长的危害以及明代社会经济等作出全面、深入、细致的分析，使读者对明代粮长制度和社会经济状况，获得全貌的认识。恩师在此书中仍然以统计学方法编制了《明洪武二十六年全国分区秋粮米实征数及其百分比》《明代历朝全国田赋米麦实收平均数及其升降百分比》《〈明实录〉中关于太祖朝垦田面积的记载》《洪武弘治万历三朝全国分区田地面积及其升降百分比》四个数据表，说明“由洪武以至景泰年间……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是步步上升的”，“直到万历中年以前，它们仍然是在继续发展之中，这从它们在生产力各方面的提高，可以得到证实”<sup>②</sup>。同时，提出明代商业资本家对“求田问舍”“广置田产”的浓烈兴趣，“因此资本的积累不免受了很大的限制，由商业资本家变成为工业资本家的极为少见”<sup>③</sup>的新见解。由此可见，此书虽然是一个小题目，但一滴水可以见太

① 见本书第77页。

② 梁方仲：《明代粮长制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16、126页。

③ 梁方仲：《明代粮长制度》，第128页。

阳，由此可知明代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这种“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的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备受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是中国史学发展的一个具有前瞻性的方向”<sup>①</sup>。因而60多年以来，史学界一直有人引用此书，所以《明代粮长制度》和《明代十段锦法》两文又被选为中国新史学代表作品之一种翻译成英文，收入1956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国社会史》（*Chinese Social History*）一书<sup>②</sup>，说明国内外史学界对恩师研究明代赋役制度的看重和推崇。著名美籍华人历史学家何炳棣发文赞扬：“已故梁方仲教授是明代赋役制度的世界权威。”<sup>③</sup>

我于1961年投梁方仲教授门下后，他对我说过，1956年完成《明代粮长制度》书稿交给上海人民出版社后，喜得学校为他配备一名专家助手，而且适是他之前任岭南大学经济商学系教授时的本科毕业生汤明榘。于是恩师十分高兴指导助手工作，两人通力合作，以《明代户口田地及田赋统计》一文为范本，运用统计学和历史学相结合的方法，利用20年收集积累的丰富文献资料，编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历五年寒暑，于1961年春完成定稿此皇皇巨著，交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夏，上海人民出版社排版出清样本，并派李文俊编辑亲自送到恩师处，住在学校黑石屋招待所，进行校对，方便有不懂之处可以随时请恩师指正，以加快校对速度。至1962年春节，校对完毕，然后携校对本回上海。后因“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非作者的原因延至1980年才出版。该书出版后引起史学界轰动，一时洛阳纸贵，很快售罄，于是上海人民出版社重印，以满足读者需求。关于此宏著的内容、编著方法、特点和意义，我于1982年撰写和发表的《读〈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

① 范鹏鹏：《〈明代粮长制度〉评介》，《新西部》2016年第23期，第95页。

② 详见梁承邨：《无悔是书生——父亲梁方仲实录》，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27页注①。

③ 何炳棣：《南宋至今土地数字的考释和评价（上）》，《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第156页。

计》<sup>①</sup>一文已作了介绍，兹不赘述。我现在只强调一点，恩师花大力气将中国自西汉至清末 2000 年古籍记载的非常零散的历代户口、田地和田赋数据经过考订、折算、归类后，以现代统计学方法，编制成 235 个表格和 6 个户口、田地、田赋升降比较统计图，加上每个表格的“表说”（解释）的新型书式，说明“我国自秦、汉以来，早已建立起全国规模的人口调查制度”，“毫无疑问是资本主义时代以前世界各国中最先进的”<sup>②</sup>，使读者对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数据一目了然。所以，该书出版 30 多年来，除了为史学界、经济学界和政府有关部门（如国土、农业、税务）的实际工作者广为引用外，还备受国内外史学界、经济学界的专家学者异口同声称赞。日本专家称本书是“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给我们提供这种材料”<sup>③</sup>的大型历史统计书。台湾学者王尔敏说：

二十世纪同代史家中有开创新路独出心裁之史表，令人惊叹并视为代表同代百年新创典范之作，是即梁方仲之《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可说是今代开山之作，无愧于历代史家。我手边备有此书。梁氏亦如宋之郑樵，乃是自古至今，贯通历代史实之作，真难能可贵，足为史表大师。

……真是前无古人，全新开创，足以备见其学问、识力、毅力之过人。<sup>④</sup>

从上述恩师梁方仲教授撰著的《一条鞭法》《明代粮长制度》《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三项研究成果，和我参加整理他于 1952—1953 年在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讲授“中国经济史（上古至清）”课程的《中国经济史演讲笔记》（已于 2008 年由中华书局作为

① 载《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 年第 1 期。

② 梁方仲编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总序”第 15—17 页。

③ 佐竹靖彦：《日本学术界关于汉唐时期“共同体”问题研究概况》，《中国史研究动态》1983 年第 6 期，第 15 页。

④ 王尔敏：《新史学圈外史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161—162 页。

《梁方仲文集》之一册《中国经济史讲稿》出版)和其他遗稿内容看,得知他的讲课内容是贯通中国历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即“中国原始社会经济”“商代奴隶社会经济”“初期封建社会经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经济”和“隋唐宋元明清经济的发展”等。再加上他在20世纪50年代撰写和发表的《户调制与均田制的社会经济背景》(1955)、《论隋代经济高涨的原因》(1956)和后来发表的遗稿《元代中国手工业生产的发展》(1982)、《元代屯田制度简论》(1983)、《关于孙中山家族的两件土地契约文书释文》(1994)等丰富内容,足以说明他除了重点研究明清赋役制度的同时,实际上他的研究范围和内容已包括整个中国历代社会经济史领域了。这就与他于1935年参加发起创立史学研究会的目的是要写一部《中国经济通史》的初衷相对接了。所以我们说梁方仲教授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奠基人和终生坚持研究的“经济史大家”<sup>①</sup>,是当之无愧的。他任何时候都念念不忘钻研中国社会经济史。

哪怕是20世纪50—60年代,我国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运动治国”思想指导下,恩师经历着连绵不断的二五减租、镇压反革命、批判《武训传》、土地改革、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反胡风运动、批判胡适实验主义、农业合作化、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反右派斗争、红专大辩论、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反右倾机会主义、整风整社、“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但他仍然钻空隙、挤时间,苦心孤诣,焚膏继晷潜心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我记得1966年7月,他已被红卫兵赶入“牛栏”劳动改造,白天到东区第二学生宿舍扫地、洗厕所,但晚间回到东北区七号寓所仍然挑灯查阅古籍,选抄资料。有一个晚上我到 he 家里告诉他,我正在等待分配工作的信息,就看到他在翻看《明经世文编》找资料。我曾痛心地点导他白天劳动很累,晚上回来就不要再看书了,要多休息,恢复精力。他却对我说:白天无时间,只有靠晚上了。顿时,我看到他瘦弱的身

<sup>①</sup> 王尔敏:《20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08页。



体，实在心酸，几近潸焉出涕。正是因为恩师有这种以追求学术而生的精神支撑，才有可能在50—60年代撰写和发表13篇论文和两本专著。还有《中国历代度量衡之变迁及其时代特征》等10篇写完未发表的论文手稿，后于1980—1990年分别在《历史研究》等刊物刊登。如果恩师梁方仲教授能活到90年代乃至21世纪，完全可以相信，他一定有更多的学术成果问世。然而，天妒英才，天不假年，他却于1970年5月18日在经受“文化大革命”的沉重打击中又罹患绝症而匆匆走完一生历程，享年仅62岁，实在教人深切哀痛和扼腕浩叹。

庆幸的是，恩师梁方仲教授自1959年至1963年在历史系所招收和悉心培养的5名研究生，个个成才，其中有4人分别在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杨生民教授）、中山大学历史系（黄启臣教授）、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叶显恩研究员）和暨南大学历史系（鲍彦邦教授）工作，继承恩师未竟的学术事业，从事明清社会经济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而且薪火相传，培养了一代硕士、博士研究生：刘正刚、黄国信、温春来、陈永升、李庆奎、黄海妍、熊燕、鲍炜、韦锦新、张桂苹、施红、沈宏、苗天娥、陆建伟、张小锋、董平均、钱永生、向咏伟、王永华等，成为第二代传人；现在第二代传人又培养了新一代硕士、博士研究生，成为第三代传人。<sup>①</sup>加上梁先生学生、助手汤明榘所培养的刘志伟、陈春声等一大批一代又一代的人才，使得恩师开创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后继有人，生生不息。

与此同时，经承邨兄长期收集恩师生前撰写的大批手稿、讲稿、讲义、读书笔记、资料汇编等，经黄启臣、李龙潜、刘志伟等整理、校正，编辑成《梁方仲文集》和《梁方仲遗稿》，分别于2008年由中华书局和2018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加上承邨兄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孝敬父母传统，经十多年辛勤努力收集资料，撰写出版了《无悔是书生——父亲梁方仲实录》和《续篇》，使学术界和广大读者诸公进一步了解和认识恩师梁方仲教授“为学术而生、为学术而

---

<sup>①</sup> 他们是侯俊云、高志超、江波、包国滔、龚志强、曾繁花、乔玉红、荀铁军、王璐、杜云南、张启龙、李晓龙、叶锦花、徐靖捷、黄文保、李镇、冯志浩、卢树鑫、徐爽等。